

天主教世界的 复兴运动 1540—1770

「美」夏伯嘉 / 著 余芳珍 / 译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 夏伯嘉 / 著 余芳珍 / 译

天主教世界的
复兴运动
1540-1770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运动: 1540~1770 / (美) 夏伯嘉著; 余芳珍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 - 1770

ISBN 978 - 7 - 208 - 13247 - 4

I. ①天… II. ①夏… ②余… III. ①罗马公教—基督教史—欧洲—1540~1770 IV. ①B9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8957 号

责任编辑 张钰翰

封面装帧 范昊如

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运动(1540—1770)

[美] 夏伯嘉 著 余芳珍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219,000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247 - 4/B · 1136

定价 48.00 元

再 版 前 言

第二版加入了新的一章《天主教书籍》，以呈现学界对于天主教罗马教会禁书、监察与出版的研究。此章也是我在初版时所忽略之处。书目亦增补了1998年后出版的著作，这些新增加的书目也是我对新创立的修会、天主教反宗教革命的圣人、在印度的传教等课题能更进一步分析讨论的基础。

在此，我想感谢以下的学者曾为本书不足之处提出建议，他们是：J. M. de Bujanda, Simon Ditchfield, Massimo Firpo, Gigliola Fragnito, Elisabeth Gleason, Adriano Prosperi, John Tedeschi, Alain Tallon, Markus Voelkel, Elena Bonora, Miguel Gotor, 等等。希望这一修订本能够补充原书的不足之处。

2004年4月

致 谢

本书的写作源起自 Robert Scribner 教授(已故)的提议,由我们分别撰写两本搭配的研究专书,由他执笔写宗教革命一卷,而我负责天主教的部分。我们的合作出自一个共同的理念:研究宗教历史不应该忽略社会面向,信仰活动和神学教义同样值得研究。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他这么多年的学术情谊。

同样的,我也感谢许多学者与学生对这本书的建议,他们是:Renée Baernstein, Wietse de Boer, Sara Nalle, Carlos Eire, Gerald Chaix, Forster, Alfons Thijs, David Lederer, James Palmitessa, Werner Freitag, Nicholas Canny, Claudine Spitaels, Wolfgang Behringer,等等。1994 年春天,我在华府 Folger Institute 也曾带领讨论这一个课题,学生热烈讨论,让我受益匪浅。1996 年春,纽约大学博士班的 Duane Corpis, Nicoletta Pellegrino, Joel Budd, Leticia Adel Clavecilla 亦给了修改书稿的建议。

在我研究和写作期间,亦得到许多机构的资助和协助,特别感谢:威尔逊总统国际学者中心、国家人文研究中心(美)、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以及我任职的纽约大学。

最后向我的夫人 Sophie de Schaepdrijver 教授致敬,她对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在她百忙之中帮助我完成此作。

本书的德文节本将由德国 Fischer Verlag 出版社出版。

导 言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是中国传教团的修会会省首长,后来在清康熙皇帝时期管理过钦天监。他在1678年写信向欧洲的耶稣会伙伴求助:如此多的灵魂需要得到救赎,然而收获却如此稀少。

自吹自擂的修辞,令人回想起早期宗教改革的语言,暗示近古欧洲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历史之间的根本一致性。双方皆主张殉道、遵从礼拜仪式和重写教会历史:在分裂的基督教图像中,显示出远比“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两个词汇的简单对立更为深邃、更为复杂的发展。本书企图梳理天主教阵营复杂的发展——无法妄称能够提供近古时期天主教历史的整体图像(这项工程超过任何单独个人的能力);对于欧洲和更广大世界的天主教领土内经历的历史事件,试图提供解释;在看似浩瀚的学术之海中,引领出一条道路。

在选择本书的标题时,我意识到避开备受争议的历史概念。艾伯特·爱尔肯在他1914年的文章中指出^①，“反宗教改革”这个词,最初出现在1770年代哥廷根法学家约翰·普特出版的神圣罗马帝国历史的手册中。作为一个法律史的概念,“反宗教改革”意谓在1555—1648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信仰忠诚的挫败。在这段时

^①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s Begriffs ‘Gegenreformatio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12(1914), pp. 473–493.

期,天主教皇帝和君侯占领和再度天主教化迄今在新教改革旗帜下的地域。在叙述成立地区性教堂(“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则的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与稳固信仰疆界的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之间的这段时期,“反宗教改革”一词并不适用于神圣罗马帝国疆界以外的地区。讽刺的是,“反宗教改革”概念出现在镇压耶稣会的1770年代,用来描述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系统,但神圣罗马帝国却在1803年消失。单数“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和复数“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在1830年代获得接受。随着新教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教宗历史,这两个词汇有了区隔。慑服于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复苏,尤其是在意大利,兰克赋予了天主教一种动态且具创造力的维度。兰克深受浪漫运动的影响,对于近古时期教宗制度的诠释,无疑地呼应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期间的大灾难之后,天主教显著恢复元气的情形。

以重建耶稣会和教宗制度复苏为特色的复辟(Restoration)精神,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转变为新的仇恨,此时正是该词在德国大学教学和学术领域中流行之际,由在晚近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之“文化抗争”(Kulturkampf)挑起。天主教学者反对“反宗教改革”的消极且反动意涵,因此反驳该词,以“天主教革新”(Catholic reform)、“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或“天主教复辟”(Catholic Restoration)取代。这场辩论在1945年后,仍时断时续。在此无须跟随其后历史诠释的每一个曲解和转折,亨利·乌特兰·伊凡聂特(1951年撰写,1968年出版)^①在他杰出的文章中,已有清楚阐明,厄文·伊瑟洛和休伯特·杰汀也有详细探讨^②。

这场辩论仍在英语世界的历史学界回响。天主教历史学家很自然地着重16世纪天主教的积极和创造性面向。皮耶·詹涅尔在

① *The Spirit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Cambridge, 1968).

② *Reformation, katholische Reform, und Gegenreformation* (Freiburg, 1967).

1963 年的研究,强调中世纪和 16 世纪神秘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以及耶稣会士的“现代性”,将此现象称为“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①。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想象使然,“反宗教改革”抗拒驱邪。甚至是亨利·乌特兰·伊凡聂特对于天主教采取深刻同情立场的研究,也保留性地使用这个词汇:“我相信在我们处理的这个例子里,本质上是‘反动’和落后的反宗教改革概念,使得天主教和天主教会逐渐适应新兴势力的诸多综合企图——无论在属灵与物质界皆然——受到了阻碍。”伊凡聂特反对强调天主教权威的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军队形象以及推动抑制良心的自由,自从 16 世纪以来,新教历史学详细阐述过这种“黑色传说”(the Black Legend)。伊凡聂特不再关注外交和军事冲突,转而关注属灵性:菲利浦·奈利、罗耀拉和在 16 世纪早期意大利城市中,赋予慈善与虔敬工作朝气蓬勃的精神。因此,这里呈现的是温和且节制的天主教精神,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坚毅严峻形象呈现强烈对比。

到了 1970 年代,出现大量重写近古时期天主教历史的风潮;有这样一个尝试,好的历史等同于在历史学上建立不同信仰之间的平衡。这一系列书籍的编者威廉朗格,在马尔文·欧康涅尔《反宗教改革 1559—1610》(1974)的序中,明确地宣布这个意图:“大部分的反宗教改革历史是由新教徒撰写的,甚至最具学术性的新教徒也很难毫无偏见。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决定将这段从 1559—1610 年的狂暴时期,交由足以胜任的天主教学者撰写,一位能够以理解的角度,写下天主教自我改革的坚毅奋斗历程之学者。”朗格并未具体说明“足以胜任的天主教学者”之特质;这本书依循该系列建立的编年体框架,以生动活泼的面貌出现。尽管以编年体写作,狭窄的年代分期框架,明显地难以捕捉与天主教复苏相关的繁复与多元历史潮流。1559—1610 年这个研究年限框架被延长:约翰·欧凌将天主教内部改革的

^①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Milwaukee, 1963).

起源,推回伊莎贝尔和费迪南德时代的西班牙,以及佛罗伦萨的萨佛纳洛拉时代^①,德意志和法国历史学家则将研究往后延长到18世纪。在新一波天主教历史研究的学术浪潮中,休伯特·杰汀的巨著《特伦多大公会议史》(*Geschichte des Konzils von Trient*)在1975年出版最后一册,这也许是天主教复苏研究年限延长的最重要推动力;这套巨著的第一册在1950年出版。

在德国,杰汀的著作(oeuvre)造成强烈的冲击,天主教历史学的新取径,并非反驳“反宗教改革”(Gegenreformation)这个词,而是提升这个概念,使之与“宗教改革”(Reformation)同等。沃夫冈·莱茵哈特的1977年指标性文章中,驳斥“进步的宗教改革”和“反动的反宗教改革”^②的对照。莱茵哈特认为,不只是教会史,在理解历史进步的全盘性方面,“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革新”并非适当的概念,“信仰的年代”(Confessional Age, konfessionelles Zeitalter)是他偏爱的词汇,由此,路德教派、卡尔文教派和天主教能够在更大的历史架构中,以平行发展的角度分析。莱茵哈特描述反宗教改革之现代性的启发性文章,最具原创性的贡献:纪律和基督教化的措施、天主教的行政管理革新、古老且基本的纽带的消解(例如亲族)、推向个人主义、注重价值和行动主义的内化(耶稣会士)、导向国家贫穷救济、修正欧洲民族中心论(在传教团)以及联结新兴教学系统、新兴政治主题和新兴经济伦理。虽然莱茵哈特的表述相当概要(部分论述缺乏论证依据),但挑战了韦伯建立的新教对于“现代性”垄断之权威论述。恩斯特·瓦特·席登的《西方的恐惧》(*La peur en Occident*)与《罪恶与恐惧》(*Le Peche et la peur*),亦关注信仰之间的平衡结构和发展。席登在描述和分析卡尔文教派历史和耶稣会士时,借由细致

①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Savonarola to Ignatius Loyola* (New York, 1969);亦可参考他的另一本书: *Catholic Reform: From Cardinal Ximenes to the Council of Trent 1495—1563* (New York, 1990)。

② “‘Gegenreformation als Modernisierung?’ Prolegomena zu einer Theorie des konfessionellen Zeitalters,”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68(1977), pp. 226—252.

化信条化(confessionalization)理论,详述特伦多天主教和卡尔文教派之间的结构平衡,着重在双方政治权力和宗教属灵性的诠释。

当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之间的对立,在德国大学讨论的辩证中缓慢地获得解决,英国和法国历史学家则扩展词汇的讨论。尚·德露缪在1971年撰写的《路德和伏尔泰之间的天主教》(*Le catholicisme entre Luther et Voltaire*)中消解反宗教改革的重要性:“反宗教改革存在着……但是就自从16世纪以来的天主教转变而言,并不是最根本的。”^①德露缪在中古和近古欧洲之间,建立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个诠释下,中古基督教(“基督教争中世纪的传说”)是巫术和异教性质;特伦多天主教代表基督教化的大规模尝试,特质是训练新的神职人员、以教义问答的方式教育平民、在非欧洲世界中传福音以及对抗大众迷信。

这个直到18世纪仍未完成的过程,退居幕后。转而是启蒙运动的抨击,连同圣礼圣事顺服、等级下降与宗教热情衰退的现象登场,一些学者称之为“去基督教化”。德露缪质疑这个词汇的适用性,也就是当大众甚至并未彻底基督教化,要如何谈论去基督教化。根据德露缪的研究,在13—18世纪之间天主教的讲道内容中,基督教呈现出复仇心重的愤怒上帝,激起恐惧和焦虑,这不是他自己理解的基督教。德露缪在出版这本书之后的二十年间,详尽地阐述他的原创论点。在《情感的历史》(*histoire de sentiment*),他以极其详尽的方式,描述在天主教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将四处弥漫的焦虑和恐惧,转变成内疚和罪恶的感受,也就是社会的“有罪化”(culpabilization)^②。为了减轻恐惧,教会提供圣礼和圣礼周边的庞大排场:祝圣、宗教性

① “La Contre-Réforme a existé... mais elle n'a pas été l'essentiel de la transformation de l'Eglise catholique à partir du XVI^e siècle.”

② *La peur en Occident, XIV^e-XVIII^e siècles. Une cité assiégée* (Paris, 1978), 以及 *Le Peche et la peur. La culpabilisation en Occident (XIII^e-XVIII^e siècles)* (Paris, 1983)。

游行、圣人、守护天使、安魂弥撒和玛利亚圣母崇拜^①。德露缪将更长期的基督教化持续期间，置于新教改革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之下，而整体图像中的历史细微部分，却似乎消失不见，逃出观者的注视。

在德露缪的评论者(和爱慕者)之中，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波西审慎地分析从中古晚期到近古基督教的根本性转变。与德露缪的异端中世纪意见相左，波西在一系列对信仰、弥撒和堂区行政的讨论中，以中古晚期社会天性效忠——亲族、友谊和所在地——为根基的前特伦多基督教，对比于由上层官员从神学与行政方面组织的官方教会^②。

初步意见一致的声音因而浮现，至少在英语历史学界。麦可·穆列特简洁地论述，主张所有的改革，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有中古基督教的根源，因此对于近古天主教的任何理解，必须将1650年之后的时代纳入考虑^③。然而，犹如穆列特短文的标题显示，部分研究在选择术语方面，仍感到不安。尼可拉斯·戴维森虽然承认“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皆不尽人满意，但仍将自己的研究命名为《反宗教改革》^④。凯斯·兰德在他的篇幅轻薄短小的教科书中，索性放弃在争论性的概念里面作一抉择^⑤；最新的导论，由马汀·琼斯撰

① 德露缪在他的两本书中，深化他的论点：*Rassurer et Protéger. Le sentiment de sécurité dans l'Occident d'autrefois* (Paris, 1989)，与 *L'aveu et la pardon. Les difficultés de la confession, XIIIe -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90)，分析告解不适当作为安心的方式。

② 波希对于特伦多大公会议之后，堂区敬拜的集中化之讨论，请参见：“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People of Catholic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47 (1970), pp. 51 - 70. 关于以亲族为基础的中古晚期基督教，与来自上层阶级的阶级组织之对照，请参见：Bossy, “The Social History of Confessio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25 (1975), pp. 21 - 38; Bossy, “The Mass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1200—1700,” *Past and Present*, 100 (1983), pp. 29 - 61; 和 Bossy,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1400—1700* (Oxford, 1985)。

③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the Catholic-Re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1984).

④ *The Counter-Reformation* (Oxford, 1987).

⑤ *The Catholic and Counter Reformation* (London, 1990).

写,保留“反宗教改革”这个词汇,甚至在拣选文献时,也把以前排除在类似教科书之外的各种主题收入此书^①。

非欧洲国家天主教的历史,是传统近古天主教的历史学研究所忽略的,在现今教科书仍旧是被忽视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教会史中,传教团的历史的确是个可敬的主题,但是直到最近,这个领域的学者,只从欧洲传教团的角度描述基督教和非欧洲文明的相遇;由于欧洲语言史料非常丰富,因此这是个能够理解的偏见。但情势有所变化。如今获得更广泛认可的研究方向,是从天主教欧洲扩张期间欧洲和非欧洲文明相遇的角度,讨论欧洲的任何基督教化历史,或构成民间宗教主题的元素,丰富研究内容。特伦多天主教研究也获得同样认可。耶稣会传教士谈到在天主教欧洲的遥远乡间角落,异教徒聚居的未开化地区(the Indies),他们同样需要传福音和教会训练;早在1585年,来自日本的耶稣会士就在翻译成德文的汇报中,赞扬天主教信仰散播到“世界的另一边”,认为在中欧失去的信徒,会在不信教的国度中得到弥补。反宗教改革,甚至在严格的定义上,需要以世界一历史为观察视角;因此天主教复兴的世纪,形成世界史的第一阶段。

因此,这些论点是我的诠释基础。借由“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运动”这个标题,我打算在世界史的大标题下,融合“天主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两个概念。我分析的天主教复兴运动包含四个主题:重新整理来自上层阶级的天主教及其教义;欧洲政治和宗教的互动;天主教复兴的社会和文化表现;天主教欧洲和非基督教世界的相遇。

在第一个主题中,我描述天主教教会在面对新教和俗人挑战之下,再次维护天主教教会司铎权威的方式。我从特伦多大公会议展开叙事,织入早期天主教改革。接下来的五章探讨教会复苏的各个

^①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Religiou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5).

部分：第六章分析近古时期教宗制度，着重在教廷国性质的转变与教宗的社会史；第二章介绍特伦多的领导修会，在天主教复兴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七章检视特伦多改革的两个进展——巩固主教权威和规训神职人员；第八章描述列入圣品和列入真福的男性与女性之身份背景，呈现近古天主教成圣的社会史；第九章检视修士和守贞女的一生，关注特伦多教会的女性经验。我以常规的方式统整这些章节，这不仅是充分信任教会史，更是强调天主教复兴运动至少在早期阶段，展现教会巩固司铎权威的努力，犹如我们所见，从世俗权威和世俗界人士的立场来看，这是一场遭遇到与其他宗教幻想境界抗争的运动。

第二个主题出现在三个章节中(第三至五章)。我将天主教欧洲区分为“殉道型教会”、“好战型教会”和“胜利型教会”，希望讨论在塑造天主教复兴运动方面，着重地理、国家情感和国际政治的角色。国家差异是特伦多改革的开端：特伦多大公会议的敕令迅速地在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被采纳，而在法国和德国，则拖延到18世纪才执行。伊凡聂特叙述，以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中心的16世纪天主教，逐渐使得17世纪法国属灵性取得优势。虽然他也许低估了17世纪地中海的贡献，但是他观察评论属灵风格和教会政治上的国家差异，则是相当正确的。在这些章节中，我试图在叙事细节的同时，不失主题结构，描述政治和宗教之间繁复的相互影响。

我们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启程离开欧洲。以地理和分析的手法，整理讨论天主教欧洲和非基督教文明的相遇。占领、殖民、强迫传福音：这是建立在美洲的模式，大幅度地复制家乡伊比利亚半岛天主教经验——俗世和教会权威之间的合作与紧张关系、伊比利亚半岛教会的神秘主义和传教狂热，以及镇压异端和“迷信”。尤其是晚近的殖民地拉丁美洲研究，丰富了我们的理解；更为细致的文化相遇和适应理论，已取代了早期的传福音和属灵征服的典范。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展现了天主教扩张的另一种模式。在这些远离天主教欧

洲核心地区的土地,托钵修士和耶稣会士在没有刀枪威吓下,推展天主教事业。拉丁美洲基督教化的历史研究,完全基于欧洲史料。和拉丁美洲的经验不同,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能够触及以当地语言撰写的庞大史料,是相遇的另一方信息。无论传福音的结果是抗拒,犹如日本的例子,或者是调适(一些学者比较喜欢“本土化”[inculturation]这个词汇),犹如中国的例子,在这类分析中获得的洞察力,让史学家从新的角度检视欧洲经验。欧洲牧师的缺乏、教会机构的疲弱、教化的不完全、未完全明了地方习俗,这些皆是传教团面临的议题。深思这个问题,让史学家建立一个比较性的框架,探讨在天主教欧洲,教会与人民、官方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关系。

最后一个主题是表达“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欧洲的人民”,这是引自波西指标性文章的标题。第十章处理天主教复兴运动在艺术方面的冲击;检视艺术的赞助、生产和消费,范围涵括从巴洛克教廷的雕刻和绘画到大量印刷给敬拜者的属灵图像集。第十四章深思特伦多改革在宗教情感和大众实践的影响:本章提出传教成功的质疑,从圣礼圣事顺服、堂区敬拜、民间崇拜,和根除“迷信”的角度界定成功与否,由教会建立标准;最后,从“基督教化”和“社会规训”的角度,尝试诠释近古欧洲天主教经验。

我的诠释必然是选择性的。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终其一生,期盼精通史料和语言,撰写一部超越教会历史传统范围和近古世界史的天主教通史。专家将会发现我对历史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上的日益茁壮成长的学术之借鉴。我已试图在广泛的书目中,向学界作一导论性介绍。如果这个综合讨论衍生出辩论和研究,将更合乎本书的目的。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特伦多大公会议	1
第二章 新兴修会	19
第三章 胜利型教会	40
第四章 好战型教会	62
第五章 殉道型教会	88
第六章 罗马教廷	106
第七章 主教和牧师	122
第八章 反宗教改革的圣人	140
第九章 虔诚女性、守贞女、被魔鬼附身的人	159
第十章 艺术和建筑	176
第十一章 天主教书籍	190
第十二章 伊比利亚半岛教会和帝国	206
第十三章 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团	220
第十四章 从胜利到危机	240
尾声	258

第一章

特伦多大公会议

特伦多大公会议于公元 1545 年 12 月 13 日召开。一群教会权贵聚集在圣三一教堂(the Church of the Most Holy Trinity),神情肃穆地步行到城镇中央的哥特式建筑主教座堂。首先抵达的是特伦多城的在俗和修会神职人员——身穿黑长衣与白斜襟的牧师,与身穿黑、灰和白长衣的托钵修士。其次入内的是地位崇高的主教座堂参议,全部都是贵族。接着是特伦多大公会议的教长,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国王(King of the Romans,译者按:也就是 King in Germany)费迪南德一世的外交使节。最后入内的是贵族和众多市民。官方代表包括三名大主教、二十一名主教以及五名托钵修会总会长。这五个托钵修会分别为:圣方济修会之下的两个支派——一个是主张朴素生活的清规派(the Observant Franciscans),另一个是主张增加信众人数,但对生活方式未加约束的会规派(the Conventual Franciscans)——奥古斯丁修会(the Augustinians)、圣衣修会(the Carmelites)和圣母玛利亚修会(the Servites)。在等待进入拱圆形屋顶的主教座堂参加大公会议开幕活动的隆重大弥撒的时间里,首次来到这座荒凉边境城市的三名身穿着枢机主教紫红袍的教宗使节,抬头仰望着白雪覆顶的山丘,回忆起春季葡萄园的景色。

他们等待了将近一年。由于迟抵特伦多的与会代表和主教甚多,因此会议的开幕式从三月进行到五月。到了七月,到达特伦多的

代表大部分来自意大利,而法国和西班牙的代表在夏末才抵达。不过,仍然没有德意志代表出席。因此,会议从一开始便有裂痕。在开幕式期间出席的代表,呈现了普世教会的极小部分。绝大部分的代表是意大利人,另外有西班牙主教两人,以及英格兰、法国和德意志主教各一人。他们几乎都没有想到,到特伦多会议最终结束时——总共十八年,历经两次长时间的中断和二十五期会议——他们自己早已离开了人世。

这场会议由三位知名人士主持。乔凡尼·德尔蒙特(Giovanni Maria del Monte, 1487—1555)是一位著名的罗马法学者的儿子,在佩鲁贾(Perugia)和锡耶那(Siena)攻读法律,之后成为教宗儒略二世(Pope Julius II)的内臣(chamberlain)。他在1511年继承了伯父西旁多(Siponto)大主教的位子,1520年担任帕维亚(Pavia)主教,在克雷蒙七世(Clement VII)和保禄三世(Paul III)在位的教宗政府中,担任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governor)和波隆那(Bologna)的副使节,1543年10月擢升为枢机主教,1550年2月被选为教宗,是为儒略三世(Julius III)。第二位教宗使节玛塞罗·瑟斐尼(Marcello Cervini, 1501—1555)出生于锡耶那附近,是一位圣赦院(Sacred Penitentiary,也就是罗马教廷的法庭,处理良心问题案件)官员的儿子。瑟斐尼是位专心致志的人文学者和藏书家,他成为教宗保禄三世(Paul III)的受恩庇人。保禄三世任命他为宗座总书记官,并聘请他教导孙子枢机主教亚历山德拉·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瑟斐尼在代理主教(vicar)的辅佐下,治理尼卡斯卓(Nicastro)、瑞吉欧·艾米莉亚(Reggio Emilia)和古比欧(Gubbio)教区,1539年擢升为枢机主教,成为教宗侄子(cardinal-nephew)信任的顾问,担任重要的外交使节。1555年4月他被选为教宗马尔塞鲁斯二世(Marcellus II),但是在位时间仅仅三周。第三名教宗使节是埃尔哥勒·龚查加(Ercole Gonzaga),他出生于名门君侯家族——曼图瓦(Mantua)的龚查加家族,同意大利与德意志的君侯王室有家族血缘关系。罗马